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5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从湖南新政到红土地革命
——湖南客家人扫描

刘祥富, 秦 柯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 中国近现代史上, 湖南人与客家人在推动历史演进中, 都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两大族群有不少可比之处。而在湖南的客家人, 融二者之长, 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物。探讨他们身上的历史人格, 当为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提供鲜明、具体、生动而又相当独特的参照。

关键词: 客家人; 湖南人; 历史人格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5)02-0120-06

一

一个族群或民系本身的形象, 以及其他族群与这个族群互相的印象, 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其历史发挥的作用之中, 包括其行为、民俗、价值观诸方面。一如人类学者詹森(Win Hugh Jansen)教授所说的:"对这些形象的分析表明: 早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之前, 就已经有了'民族性格的研究'。"[1]

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中国族群: 客家人与湖南人, 也正是在这种比较中凸现了出来, 这也是这一研究价值的体现。

中国的近现代史上, 客家人与湖南人的历史作用, 几乎可以平分秋色。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冲天"的历史主动精神, 他们对推翻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贡献, 可谓不分轩轾。19世纪中叶, 湖南人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 令"国人广开眼界, 悟其御侮之道"(林则徐语), 客家人洪仁轩则有《资治新篇》, 要引入西方的先进制度; 客家人陈宝箴任湖南巡抚, 黄遵宪任按察使, 把湖南的新政, 搞得风生水起; 菜市口喋血, 湖南人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 而客家人刘光弟"行刑后, 身挺立不仆, 观者惊叹"; 辛亥革命的主帅, 孙黄并称, 孙中山是广东客家人, 而黄兴是湖南长沙人; 及至土地革命, "朱毛红军", 朱德是四川客家人, 毛泽东则是湖南湘潭人。至于后来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 则既是湖南人又是客家人, 与他一样的, 还可以数出很多, 如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著名上将杨勇、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等等, 均是来自湘赣边界的客家人。

湖南人坚强坚韧, "湘军"以死守著称; 客家人也忠诚执着, 淞沪抗战中, 以坚守四行仓库名扬天下; 湖南人"圣贤学脉"一以贯之, 前有屈子, 后有王夫之, 近代更有沈从文、周立波、丁玲、田汉等大师; 客家人崇文重教, 文天祥、黄遵宪、丘逢甲一脉相承, 近代更有郭沫若、李金发等文豪, 相映生辉; 湖南乡下有"学谷", 奖掖好学的学子, 不分贵贱; 客家人也有"学田", 同一宗旨, 旨在培育人才;

收稿日期: 2005-01-19

作者简介: 刘祥富(1972-), 男, 广东梅州人,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与文化.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湖南人犟，被叫作“湖南骡子”；客家人好强，人称有“硬颈”精神；湖南人不怕死，客家人死不怕。

陈独秀在 1920 年的《新青年》“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引用 Oliver Schreiner 夫人小说的几句话：“你见过蝗虫，他们怎么过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2] 从而指出：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只有“蝗虫们在河中用死骸堆积起来”的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底价值。

祖祖辈辈的客家先人们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赣闽粤大本营，再从大本营发散出去的历程中，也同样建造了客家精神这一不朽的桥梁，从而使客家人的生命，得到真正延续，他们也似陈独秀讲的“过河蝗虫”一样，死不怕。又有谁知道或统计过，在千年大迁徙中“十口余一”的客家人中，有着多少殉难者？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列出更多。

包括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几乎如出一辙。他们一般热情好客、义气当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义轻利”；他们善于做学问，也“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大会做生意，正是“重学轻商”……

因此，拿湖南人与客家人作比较，从中引发出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思考，尤其是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改造国民性”（鲁迅语），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而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层面上，深入探究，也更有学术价值。少了这一比较，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也就有所缺失……

二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近代有人评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是因为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湖南古称“三苗”，自古以来为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多次遭受战火蹂躏，导致人丁锐减，十室九空，因此明初和清初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即民间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湖南的客家人，也大部分是这个时候来到湖湘大地的。据近年来各项研究资料，目前湖南有非纯客县（市）11 个，分别是汝城、郴州、桂东、酃县、茶陵、攸县、浏阳、平江、江永、新田、江华等，总人口 200 万人左右。

清初的大移民，大部分人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赘述了；而明初的移民，则说的不多，尤其是客家人迁入湖南，更很少人说起。原来，在元亡之际，农民起义军在南方有一支劲旅，是在陈友谅率领下的。元朝灭亡了，陈友谅也就在南方称帝，这自然得到南方的老百姓的支持，可不能相容于已进了南京皇城的朱元璋，“天无二日”，于是，发大军平了陈友谅。由于老百姓支持陈友谅，于是，从湘赣北一直横扫到了粤北，几千里的灭绝政策，使这片土地十室九空。如粤北的英州，本有 2000 多年历史，大屠杀后，城中只余百十人口了。

这些地方“清空”了之后，大量的客家人，也就自东向西，分别从赣南、闽西、粤东北过来，填补了“空白”。进入浏阳等地的，大都被称之为“棚户”，他们已是操一口纯正的客家话了。笔者在湘东酃县、粤北英德都生活过，两地的客方言，大都与梅县口音差不多。

也就是说，客家人到过湖南，已有六七百年之久。我们看到今天的《浏阳县志》，其东部相当多的区域，都属“客方言区”，而《酃县志》则更有大部分区域属“客方言区”。其他的县志，也一般有明确的划分。这就是说，这些明初到达的客家人，是长期浸润在湖湘文化的浓厚氛围之中，在他们身上，融合了湖湘文化与客家文化这两种文化。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一旦这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话，当会铸造出怎样的历史人格，而这种历史人格，又当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闪耀出怎样的文化光彩？

这两种文化的结合，在近现代史中，最为典型的，当是戊戌变法中湖南推行新政，以及土地革命中的秋收起义——也就是近现代史上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民族救亡图存的几大革命之一的土地革命。

前者，如前所述，在颇具改良思想、且能放眼世界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主持下，湖南的“新政”方如火如荼。陈宝箴是江西修水的客家人，以他的名义，为湖南新政之一时务学堂发布《招考示》，称“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并由黄遵宪推荐，延请戊戌变法变法的主帅梁启超、以及李维格分任中、西学总教习，而梁之下，亦延揽了一批同是康有为的学生担任中文分教习。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促使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使湖南各地学校纷纷设立，令书院制度发生改变[3] 372。

在陈宝箴支持下，还组建了南学会，加上《湘报》配合宣传，新政迅速在湖南推行，“民智骤开，士气大昌”。陈宝箴称《湘报》“指事类情，询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新政既立，即鼓励兴办实业，“整顿吏治”“改制”变法……总而言之，几位客家人陈宝箴、黄遵宪在湖南主持之际，把新政办得风生水起，成为全国唯一呼应戊戌变法的地方政府[3] 411。虽然二位结果均很惨，陈宝箴被“赐死”，黄遵宪死里逃生，罢免还乡，但是这一新政，为湖南的先进历史人物脱颖而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场所。后来，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土地革命的领袖人物，如黄兴、陈天华，一直到毛泽东等，都深受影响。可以说，这是客家人在湖南主政打下的基础。客家人关于接受外来先进思潮，又敢于锐意革新的精神，在湖南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而土地革命更是如此。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其主要发生地及主力人员产生之处，便是修水、铜鼓、浏阳等地，基本上都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使这支队伍往复辗转上了井冈山，也还是在客家人的地盘内。起义军在浏阳文家市集结，追随队伍而去的，有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客家人杨勇；更有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浏阳的客家人中，出了不少历史名人，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的原型李白，第一位共和国女将军李贞，以及在中共党史颇负盛名、抗日战争中南下支队的政委王首道等等。当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后，迎接他们的也是客家人袁文才，他已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有了立立足点。当年毛泽东率队伍自浏阳文家市集结后南下时，“军至莲花，接到宋任穷送来江西省委的指示信，省委明示秋暴队伍：‘你们可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的党，有一支几十支枪的队伍。’”[4]

一般人都把井冈山根据地看成是江西的，因为井冈山中心茨坪正是在江西宁冈县内。其实，井冈山根据地包括的四个县——永新、宁冈、茶陵、酃县中，后两个都是属于湖南的，而且跟前两者一样，也都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及至井冈山会师，从南昌八一起义打下来的部队，也正是客家人朱德所率领的。

所以，从秋收起义、文家市集结、井冈山会师，土地革命一开始，就与客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中国工农红军日后在赣南客家大本营建立中央根据地，把苏维埃政府定都于纯客县瑞金，也是不无关系的。我们从毛泽东所著的《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土客斗争的印象非常深刻，对客家人的艰难处境、斗争精神，也有着不同一般的认识。胡耀邦在根据地中，由于会说客家话，常被召去调解土客矛盾。所以，湖南的客家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加深认识客家人的一个中介。沿罗霄山脉一线的西部，属湖南境内，正是当年填补朱元璋“清空”后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去的客家人，而这一带的客家人，也出了不少红军将领、工农领袖，这包括被子冤杀的袁德生等一批早期红色苏区的领导人。

三

可以说，客家民性，也同样融入到了湖湘文化之中。这不仅有湖南“新政”领衔人客籍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为证，更有秋收起义中一大批湘籍客家人的将领、领袖人物为证。没有他们的敢为天下先变革、起义，也就很难在湖南形成那么大的气候。湖湘文化与客家文化的相结合，当如珠联璧合，焕现出更奇异的光彩，这才有后来土地革命、共和国革创的丰功伟绩发生。

周兴旺在其《湖南人，凭什么？》一书中，认为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蛮”者，恰如陈独秀所言的那种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

“蛮”，当是一种能吃苦耐劳，而又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

首先，作为湖湘文化前身，楚蛮文化特质的原始层中，就是它那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就包括了“筚路蓝缕”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英籍华人韩素音在《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一文中认为“因为客家人的流动性，刚强和精力充沛，各个朝代都把他们作为有潜力的开拓者，可用人烟稀少的地区去重新定居。”的确，一部客家民系发展史，事实上就是客家先人及其后裔在中国南部广大地区拓荒、垦殖的历史。正是在他们世世代代的辛勤开拓下，历史上瘴气肆虐、人迹罕至的闽粤赣地区，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家园；长期以来被历代统治者“以处迁客”的荒山野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经国济世的英才。台湾学者陈运栋把客家人更是直接地称作一个“垦殖的族群”，这一概括是相当确切的。可以说从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迁，再到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大本营向南方各省、甚至海外的迁移，自始至终都是以拓荒者的面貌出现的。

另一方面，客家先民不得不在人口膨胀或天灾人祸之时，作出一次甚至多次的迁移。故而往往又具有较多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从而有“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的豁达、超脱与大度。

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把南方人称之为“南蛮子”，而从中原迁到南方的客家人也不例外。如明代著名民族英雄袁崇焕是客家人，但在崇祯皇帝口中，还是把他称之为“南蛮子”。北胡、东夷、南蛮、西狄，这是自古以来沿袭对不同方位的边缘族群的称谓，本来是带贬义，乃至有歧视意味的。

可今日之“蛮”，分明有赞赏、推崇之意味。

提到湖湘文化，不能不说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是互相辉映的，而且这种精神是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心态的源头。当然，湘学的学术思想又总是透露出湖南人的那种刚劲、务实的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所以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血诚”、“明强”，“诚”和“明”的理念来自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和“强”的观念则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他主要是既看中山民们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曾国藩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客家人素有质朴务实的风格，这一性格的造就，因素约略有三：一是中原古风的遗存，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历史条件所致。客家人饱经种种艰辛历程，备尝创业艰难之苦。一切从头做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起，没有任何现成饭可吃，只有靠两只手才能开辟新的天地；三是与贫瘠的地理环境有关。当迟到的客家先民迁来南土时，富饶之区已为捷足先登者所踞，故只能向偏僻之区寻求立足之地。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昔日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只有依靠“勤俭”精神，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开明、务实、勤业、敬民，是胡耀邦为政的最大特点。他讲真话，襟怀坦白，坦坦荡荡，是真正的人民公仆。1958年秋，是著名的“火红的年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各地迅速贯彻，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还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于这些不科学的提法和失实的浮夸，干部和群众有很多不同意见。为了压制这些意见，有关部门还提出了“树红旗，拔白旗”的措施，对不跟他们走的群众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就在这样的时候，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湖南进行调查研究。一次，他向一位农民兄弟询问对人民公社的看法，被问的社员直率地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对于这个答复，在旁边陪同的干部大惊失色，却不料胡耀邦很欣赏这句大实话，还以同样坦率的口吻说：“好！你不干，老子也不干。”这以后，他在广西接见共青团骨干的讲话中又坦率地转述了这个细节，他说，人民的事业需要人民讲真话，讲真话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至于他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是有口皆碑，家喻户晓。

这些，都是湖南人和客家人质朴务实精神的最佳体现。

“蛮”文化特质中，有一种自强的精神。从鬻熊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荦路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战国时周王国分封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后来因内部矛盾让秦有机可乘，最终统一了中国。但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被楚灭亡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俗语，而秦最终亦为楚人所亡！所以说，湖南人与生俱来的蛮劲，是一种特立独行、自强不息、虽九死而不悔的执著精神。

而作为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支系，客家民系得以繁渊不息和发展壮大，团结互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概而言之，客家人团结互助精神的形成，一是宗族观念较牢，“惟聚族而居，故无畛域之见，有友助之美”；二是作客他乡，必须凝聚与协调内部力量以对外；三是受儒家思想感染，诚如民国《龙岩县志·礼俗志》卷二一所言：“孟子所谓友助扶持亲睦者，庶几近之。”而到了近现代，随着客家人的播迁，客家人更是遍布五湖四海，远在他乡，客家群体之间的团结互助更为彰显。

在客家民系中，有一种颇为强烈的自信、自立、自强、自我奋斗意识。他是客家民系在独特生活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客家先民经历了长期的迁徙生活，往往是仓皇被动的逃难（战乱或天灾），而不是有计划的、从容主动的搬迁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充满自信，并有自立、自强、自我奋斗意识和能力的人，才可能在颠沛流离中坚持下去。客家民系的“自信、自立、自强、自我奋斗”意识是最基本的、最带根本性的特性，其他许多品性亦由此而生。譬如客家人重文教，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志，才能有出息。此外，客家人的传统思想中深深地打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烙印。遇国家、民族危难时，纷纷挺身而出，锻造了客家人威武不屈的性格。

胡耀邦、王首道、杨勇等人，都出身于贫穷家庭，但都因为客家人重文教的这一传统，父母和族人坚决为他们创造条件，得到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并为他们在民族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正是自立、自强的意识驱使着王首道等老一辈革命者不断地追求自身的提高，而他们在革命中所经历的磨难，更充分体现了湖南人和客家人那自强不息的性格精神，并为共和国的缔造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正是这一“蛮”，熔铸了湖南人兼客家人这么一批共和国的开创者自强、自立的顽强精神，在勇敢奋斗、不断开拓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既是湖南人又是客家人的出色的领袖人物、军事将领，如前所述的胡耀邦、王首道、杨勇、李贞等，探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历史人格，是会加深我们对两个族群的优秀品质的认识，为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文化、历史的研究，提供非常鲜明、具体而又生动的参照。

参考文献：

[1] 阿兰·邓迪斯编，陈建亨等译. 世界民俗学[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63.
[2] 周兴旺. 湖南人，凭什么[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
[3] 汤志钧. 戊戌变法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舒　龙.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56.

From New Politics in Hunan to Red Revolutionary in Agrarian ——the Portrait of Hakka People in Hunan Province

LIU Xiang-fu，QIN K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In early and latter modern history of China，both Hunanese and Hakka peopl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history. There are lot of things which can be drawn out for comparing between the Hunanease and Hakka people. The Hakka people in Hunan province are particularly “in double harness”. It means that the Hakka people in Hunan have both the advantages of Hunanease and that of Hakka people. There have been dozens of outstanding Hakka people from Hunan province in the history. The study of their historical personality will provide fresh，concrete，lively and unique references for anthropology，sociology and culture studies as well.

Key Words：Hakka People；Hunanese；Historical Personality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